

土炕温情

□王伯民

我家在华北农村,我是在土炕上降生的,自然在土炕上摸爬滚打长大。暖烘烘的土炕温暖了我童年的记忆,也捂热了我的人生历程。

记得上世纪村子里几乎每家都有土炕,每到黄昏家家户户房顶上都冒出缕缕炊烟,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子土烟味,充满着那个年代浓浓的生活气息,远远望去,村庄祥和安静。

土炕是屋内有限空间的“霸主”。“一间屋子半间炕”,三面依墙,土炕盘在向阳靠窗户的地方,以便于冬季充分享受阳光,吸收热量温暖房间。

土炕的外形结构看起来非常简单。以土为主,下边以大坯作为支撑,上边用棍棒、芦苇或秫秸秆铺面,然后用碾泥巴、土、坯挤严夯实,再用细糠泥分次均匀地罩上面,外边用砖砌好炕墙,炕墙上沿装上木制或半片竹篙做的“炕沿”,类似于现在的“床头”。可炕面下内部并不简单,所垒的烟火通道类似迷宫,有宽窄之别,有起伏之变,有错落之分,有通向之辨,讲究很多,技术含量较高,若盘得不科学不合理,不是排烟受阻不畅,就是费柴留不住热量,或炕面受热不均。

炕热屋暖,炕凉室寒。冬季除灶台做饭的热乎气外,要想炕热屋暖,就得烧炕补充热量。在那物质匮乏的年代,没有煤、没有天然气、电缺少,做饭用的柴禾也不充足。想法找到各种能烧的材料把炕烧热成为父亲的一项重要事情,搂柴禾、打野草、捡树枝、刨树墩、找杂物还是不够,豆皮、树叶、棒子核,甚至牲口吃剩下的草根小棒都要收集起来。父亲勤快爱干净,是出了名的“卫生标兵”,时常起早贪黑清扫院中街上的杂草杂物,以获取更多的燃料,既清理了屋内院中街上的环境,又烧热了土炕温暖了屋子,一举多得,我从来没有见过父亲睡过天明觉。

温热的土炕是全家人睡觉的地方,也是我们兄弟姐妹欢乐的地方。记得小时候,一大家子七八口人睡在一个炕上,孩子们扒着炕沿像鸟巢中的小鸟,虽然拥挤,但有说有笑,打打闹闹,非常和谐,相互追逐嬉闹,土炕成了“蹦蹦床”“游乐园”。大炕是奶奶孵小鸡的地方,是母亲蒸馒头发面的地方,是晾干衣服的地方,是孩子们烤土豆、红薯、花生的地方,是父亲盘腿给我们讲故事的地方,也是过年过节全家人休闲娱乐的地方。

温暖的土炕还是吃饭的地方。一个小方桌放在炕的中间,这是冬天一家人吃饭的标配。奶奶坐在中央,我们按照大小分列两旁,父母分坐在炕沿把桌子两边,方便添加饭菜和保护孩子们的安全。那时候饭菜不多,品种单一,质量不佳,少有鱼肉,大家围在一起,桌上热气腾腾,孩子们狼吞虎咽,其乐融融。这个小方桌又是孩子们学习、写作业的地方。

夜里,疯跑一天的我们早已累得倒头睡下,可整日劳作的母亲依然有忙碌不完的活计。小方桌上如豆的油灯



下,满头华发的母亲总是盘腿坐在炕头上,眯着眼一针一线为我们缝补破烂的衣服和鞋袜。我不知道母亲何时睡觉,只知道每当过年过节走亲有喜事时,我们都穿戴得干净整洁。父母每天起得最早,睡得最晚,恨不得把所有的时间都用于操持家务上,他们为儿女操劳的专注神情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里。

过去的土炕可睡可卧可坐,是卧室是餐厅是会客室,是一家人交流的平台,是家人最温暖最亲近的地方,是一家人享受天伦之乐的重要场所,也是邻里亲朋感情交流的“温床”。

在过去,土炕是老祖宗聪明智慧的发明创造,温热了屋子,温暖了家庭,温暖了生活。不仅烧的草木灰还原土地,三五年重新更换的炕坯还是上等极佳的庄稼肥料。“三亩地一头牛,老婆孩子热炕头”,土炕成为当年老人们生活的中心舞台。

离开老家后,我时常想起故乡的大土炕,它是几辈人从出生到终老的地方,犹如一缕浓浓的亲情乡愁,时刻萦绕在我的心头。每次回家看父母,除了感受老家淳朴的亲情外,最让我陶醉的就是睡土炕,即使屋外大雪纷纷,滴水成冰,在外面冻个透心凉,只要回到屋里,周身就会暖意浓浓,晚上往土炕上一倒,既抵御漫漫长夜的寒冷,又舒筋活血,热头暖脚,真是惬意舒服。闻着泥土气息的炕味,那种踏实、宁静和原生态的感受,让人沉沉地进入安谧的梦乡。

永远难忘的是,老家大炕边总是放着一把小笤帚,父母把炕扫得平平坦坦,干干净净,被褥叠得方方正正,码放得整整齐齐,老俩坐在炕沿上唠嗑说家常,那场景温馨舒畅,家味十足。永远难忘的是,当父母知道我晚上回家,早早把土炕烧暖,把被褥提前铺好焐热,等我到家钻进温暖的热被窝里,说东道西,问生活问工作,有说不完的话讲不完的事,一说就是半宿,一直将我送入梦乡。

每当我在城里家中难以入睡时,便情不自禁地想起老家,想起父母,想起土炕。我总觉得,睡在那充满温情的土炕上,才能与天地融为一体。只有深入和贴近故乡,拥抱与融入那片土地,才能令人舒心、踏实和幸福。

场院里的童年

□韩占江

我小时候村子里还是生产队模式,每个队除了相对固定的耕地,还有一座用来存放农具和饲养牲口的场院。一队的场院临着大街,与我家仅隔一个胡同,那便是我们童年的乐土。

记忆中的场院颇为简陋,大门是一道稀疏的栅栏,于我们而言形同虚设。当然,进出场院我们还有另一条路可走,就是从我家南院的大槐树爬上去,顺着粗大的枝干越过胡同再跳进去,也不算太费事。

从大槐树爬进场院,落脚处恰是一个高高的麦秸垛。一群孩子在麦秸垛上推推搡搡、大呼小叫着找一处斜坡,像坐滑梯一般鱼贯而下。麦秸垛的四周早被我们掏出一个一个洞来,那是下雨天临时起意挖出的避难所,当然还有另一项用途,可以当做各自的藏宝阁。有一年夏天,我们顶着酷热,瞒着家里大人,将北院的桃子提前收获,而后用上衣兜着跳进场院,塞进“藏宝阁”里。本想吃个长远,结果第二天再去,竟一个不剩,平白落了一身痒。

麦秸垛北面是一座碾子,紧挨碾子的西屋是队上的储物间,里面堆满叉耙耢犁。场院的北屋是正房,说是正房也不过几间泥坯草顶的小屋子,东头两间长期当牲口棚,西头一间既堆放饲料,也是饲养员的卧室。

场院的东面没有房子,只有一溜儿矮墙,因此,东邻的枣树就有一半枝丫跨过界来。每年中秋前后,小枣红透,赶中午时分,所有街巷都安静下来,我们悄悄爬上墙头,耐心地摘捻红透的枣子,一边摘一边吃。偏有手快的,早早装满了口袋,故意大喊:“来人了。”一群人便“噗通噗通”跳下地来,捂着口袋,慌忙窜出场院,作鸟兽散。

场院的南面也是一堵泥墙,那是二队的场屋。墙根下戳着几个石碾子,最大的那个是个碾砣,得需两人合抱。其余小一号的是碌碡,用来打场、轧麦子、碾豆子。大碾砣据说有800斤,我们玩不转。那些小碌碡只有二三百斤,在无聊的冬日就成了我们的玩具。一开始我们只敢推着它们满院子跑,渐渐地就敢站在碌碡上,用脚踩着在场院里滚来滚去,那娴熟的技艺,比起队上的棒小伙子也丝毫不差。

虽然场院里没有树,却也不乏生机。到了春天,院子里会钻出无数的牵牛花。随着夏日渐长,牵牛花将四面泥墙都包裹起来。一进院子,首先入目的是一片浓郁的绿,再近点,就发现了点缀其间的喇叭花。那花墙年复一年地装点着炎热的夏季,也装点着我们多彩的童年。

生产队解散后场院一度闲置,后来几经易手,却也一直没建新屋,便生出不少树木。前两年回老家,发现村委会将这片林子修葺一番,在林下铺了石板路,林间安上了健身器材,昔日的场院又变成村人休憩锻炼的好去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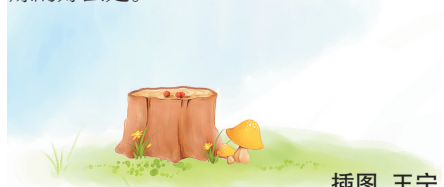


插图 王宁

红薯面条机

□汪永年

上世纪六十年代,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用品依然是凭票或凭本定量供应,粗细粮“三七”开,即30%的细粮,包括大米、白面,70%的粗粮,就是玉米面、高粱面、薯类等杂粮。市民们为了尽快消化掉定量供应的粗粮,就想到了粗粮细做,于是,红薯面条机应运而生。

最初的红薯面条机用容易找到的槐木制成,样子看上去较为古朴,其形状像条凳,四条腿上固定着一根直径15至20厘米的圆木,在圆木中段凿

一个直径10厘米的洞,洞孔下面钉一个铁筲子。圆木上方的一端装一个压杠,上面镶一根直径、长度与那个洞相匹配的圆木,称为榫子,尺寸以插入床座圆孔为准。

我的一位街坊家就有一台这样的面条机。

在当时这可是件新鲜事。街坊四邻好像商量好似的,两三家甚至五六家都在同一天的中午蒸红薯面窝头、饼子,东家用完西家用,出了南院进北院。有的人家为图吃个新鲜,还从农村亲戚家要来榆皮面,说是掺着和面,面条更筋道更好吃。

压红薯面条时一般是两人操作,一人将红薯面窝头、饼子放进洞口,另一人抬起压杆下压,通过榫子的挤压,只听吱吱声响,一绺绺两三毫米粗的圆形红薯面条就会从铁筲子下顺势而出。

后来,红薯面条机有了升级版,用的全是金属材料。我厂机修车间师傅利用杠杆原理,在压面机的三条铁腿上固定了一个铁“桶”,“桶”底钻许多小孔,“桶”上面有俩立耳,上面固定着一个带丝杠的圆铁饼。当面食放进“桶”内,一人用力扳动丝杠上端的加力棒,“桶”内的面食即可向下运动压成红薯面条。

红薯面条可配上肉丁或鸡蛋卤吃,或淋上花椒油、醋、蒜凉拌着吃,比吃窝头、饼子口感好,令人食欲大增,可谓粗粮细做的经典。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,为了生计,一些精明的乡下人骑车进城,用自产的大米换城里人不爱吃的粗粮,红薯面条机也便在市民中渐渐失宠,我那台后来也当废品处理掉了。

在物质匮乏的年代,这种民间蕴含的智慧和做法值得嘉许。

